

寻根于沅水流域的沉思与构想

——论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

沈光明

当前,学术界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研究已经从地域性的外部形态描述深入到了作品内蕴的把握,例如凌宇同志就敏感地指出:“沈从文的创作,鲜明地表现出深邃的历史视界”^①。但这种把握还只是一种直感性的判断,缺乏科学分析的精确性和审美判断的价值观。因此,本文着重论述的是:沈从文创作的深层内涵的历史渊源以及作者在追寻这种渊源时的沉思与构想,从而对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作出一些符合实际的评价。

沈从文一开始创作就与整个现代文学对国民性的探讨处于同步状态。在一九三一年写的《甲辰闲话》里,他就对自己的创作作了一个宏大的规划,其中之一是要为他的故乡——边陲极境的湘西、写出“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②。因此,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便以特有的风貌情态表明了作家对民族意识和历史心态的深刻关注,而且以热忱的态度对民族劣根性作了“一种善意的记录”^③,虽然在他执着的追寻中不无悲凉的气氛,然而伴随着严峻的民族危机感同时也表现出过多的乐观情绪,“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④,则是沈从文小说的总的风格,也是沈从文对“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特殊的社会组织”^⑤的一种高度信念的表示。

但是,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所蕴含的深层的历史和民族意识却是极为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不仅表现为空间区域性的区别,更表现出纵向历史性的不同。简言之,他所反映的不是以儒学为骨架的传统文化,以及在这个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是以荆楚文化为背景,在绚烂多姿的荆楚文化展示中升华出来的是作者人生社会的理想图式。

我们认为,沈从文湘西小说所追寻的不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文明,而是已经消声匿迹了的荆楚文化。当然荆楚文化也部分地汇入到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文化中不乏楚文化的若干因子。但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的,而儒学是一个具有自调节,自控制,说开放,又封闭的强功能系统,因此,各种文化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便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了。和整个新文化的大趋势相吻合,沈从文也如同五四先驱者一样,向具有象征意味的孔家店发起了一次次进攻。例如在《中国人的病》一文里,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支配中国两千年来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⑥在《看虹摘星录》后记里,他认为愚蠢而自信的儒者“对人生,惟繁文缛礼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组织上”^⑦,在沈从文的创作里,我们看到了作者这种理智的判断化为形象的骨肉时,是多么痛心地感到这种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摧残。可爱的福生在卡指甲先生的严威下是如何失去了一个小孩子的活泼天真与好奇心;一对原人似的夫妇是如何在礼仪的束缚下差点送了性命。作者这种心理倾斜,不正是对传统儒教思想的蔑视与否定吗?

然而,沈从文毕竟是一个作家,他不可能对儒学传统作系统的批判,他的任务是对他所熟悉的湘西社会的真实反映。而在他笔下的“极端土地性的

①《沈从文选集·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②《沈从文文集》12卷86页。

③⑤《沈从文文集》第4卷。

④《沈从文小说选》第4页。

⑥《沈从文文集》12卷第321页。

⑦《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52页。

人物”和极为独特的风土人情里则保留了绚烂多姿的楚文化的遗风。

苗族较为集中地居住在边远湘西，既是历代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成果，又是保留楚文化最多的区域。当我们礼赞楚文化灿烂辉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所谓苗蛮民族对楚文化所作的特异贡献。没有苗蛮民族土著文化，就不会有与中原文化媲美的荆楚文化，这已为考古学，历史学，神话民俗学等多学科所证明。历史总是在一种二律背反的悲剧中进行，惶惑不安的苗蛮民族不惜以血的代价在一个封闭式的边陲极地里为楚文化留下了现存的空间。古朴的苗民过着古朴的生活，辰河流域便是他们活动的舞台。他们不是用文字记载楚文化的历史，而是用风俗加民情保持着楚文化的繁衍嫡传。这为异常熟悉湘西生活的沈从文提供了大量的有血有肉的楚文化的原始形态。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里，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楚文化的巨大存在。例如《神巫之爱》，我们看到了神之予，人之神的神巫，是多么向往一种真正人间性的美满生活。他一方面为别人祈求幸福，一方面又为自己在寻求幸福。为别人的幸福他要做完规定的法事，为自己的幸福他要做完最后一道法场。屈原《九歌》里的人神相恋反映在这里的是真正的人人相恋。象这样直接描写神巫、法事的场面，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里既是大量的，又是散见的，它表明了巫风在湘西社会犹存的盛况。而苗民的喜歌善舞，则是巫风浩荡的真正原因，也是沈从文所乐意记录的。这里的歌声千姿百态，美妙古朴，既有敬祖祭神时所唱的各类神歌；也有婚丧大事或乐或悲的心曲，更有青年男女互诉衷肠，互为追寻的情歌，那缠绵中有时不免粗野，真诚中有时颇含滑稽的歌词实在令人心醉。歌声是苗民的语言，苗民的思维，也是苗民记录楚风楚俗原始歌舞的“原声带”。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不只这些。《神巫之爱》中那个白发的调停长者，显然具有民族社会元老派的遗风；那些争相取悦神巫的可爱的女子们，显然带有屈原“山鬼”形象的面影；更不谈《雪》中娘俩的热情好客，《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三个男人的和睦相处，《边城》里祖孙二人仗义疏材的淳朴民情，《旅店》里黑猫的“个性自由”……这些充满了和平宁静平等相爱人事关系上是楚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映。

二

明确了沈从文小说所展示的特有的风土民情历史上渊源承接关系之后，我们发现，作者在他热情

地描绘中似乎想告诉我们一点什么，这就是作者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所透露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合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①。这就是说，作者企图以荆楚文化为背景来建构起一种人生社会的理想模式。这种构想，表明了作家一种美好的“德性”，即“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②，表明作家对民族的命运思考：“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是能用思索的人就目前环境重新去打算重新去编排上”^③。事实上，现代文学史上众多作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和现实，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的伴随下都具有民族新生的责任感。只是有的作家如鲁迅以否定的形式对民族劣根性作了过多的扬弃，而沈从文则以肯定的形式对民族劣根性作了过多的礼赞。而这种礼赞又建立在几乎失传的荆楚文化上，因而他的人生形式的构想不能不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那么，沈从文提供的这份“土仪”——以湘西社会为依据建构的人生形式的理想模式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一）人性的自然发展。如前所述，在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发展序列中，由于中原各地较早地进入宗法社会，孔子又把产生于原始巫术仪礼的周礼的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因而人性的发展完全限制在伦理道德狭小的圈子里，发展到程朱理学时则对人性进行了毁灭性的围剿，以致人性在正统空间得不到一块存在的绿洲。人性的限制带来的是人性的异化和变态。所以沈从文曾悲慨地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心愿蠢事”。^④这虽然不免偏激，却反映了沈从文对扭曲蠹蚀人性伦理道德极端反感情绪。为此，沈从文全部小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对人性自由的向往和歌颂，沈从文甚至“只想造希腊小庙”来全心全意地供奉他理想的“人性”。^⑤

人性的自然发展在沈从文的小说里表现为对爱情甚至对情欲的热情描写上。从沈文对情爱的描写具有各种形态，自由的，真诚的，热烈的，原始的，粗野鲁莽的，文静优雅的等等。但以自由真诚热烈为共同形态，而又显出原始粗野和文静优雅两

①·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99-230页。

②·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5页。

③·沈从文文集·第11页第34页。

④·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266页。

⑤·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2页。

类不同特色。前者以《柏子》《采蕨》，《雨后》为代表，后者以《边城》《龙朱》为典范。《柏子》力图展示一种原人式的性爱特征，性欲的冲动，粗野的动作，不为钱财，不讲卫生，只要有那种力，那种本能，那种愉快，便是吊脚楼上女人的幸福，也是河上水手的幸福。《采蕨》则勾勒出性早熟的少年的性本能。对异性的神秘感和饥渴感，使这种性的萌动具有某种动物性的特征。《雨后》一次性行为的发生，则宣告了读书人防线的脆弱。阿姐在四狗身上一方面得到的是气力，强硬，另一方面得到又是温柔、陶醉。这一类作品，作者展示的是人的生理本能的自然发展，突出的是一种力，一种强悍。但如果这一类作品还给人过多原人或半原人性爱的印象，那么《边城》一类的作品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爱情的理想图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翠翠在外公的抚育下逐渐长大了，女孩子随着人事的积累和身体的变化显出一种性爱的萌动。这种萌动虽然是那样朦胧缥缈，却又是那么顽强实在。对新嫁娘的好奇与看水鸭子打架的搪塞，是那么奇妙地融合在这个小姑娘的心里。对二老并不是一见钟情然而又是那样的难以忘怀。小伙子勇敢漂亮，心地善良增加了翠翠的几分幻想，以致于二老的哥哥托人说媒也不能拨动她爱的琴弦。只是带碾坊的待嫁的姑娘增加了她几分忧伤。然而这淡淡的忧伤并没有动摇萌动中少女的一缕情丝。不管是走水路还是走马路，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作者在这里似乎表明了这样一种爱情观：不带任何附属物的平等性爱。要渡船还是要碾坊，二老作了感情上的选择——爱翠翠本人而不是地位与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同时爱上翠翠的兄弟俩，大老又作了感情上的让步——因为在他看来，二老与翠翠具有相当的人品才能；最终爱外孙女的爷爷，对翠翠的意中所属又流露出感情上的模糊——他仁慈地试探着翠翠的口气，又善良地为外孙女作着红娘。这些感情上的曲曲折折，虽然不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但却共同为爱情作了这样的解释：平等、自由。这种爱情观，与讲门第，论地位，才子佳人，德音之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迥然不同。

性爱作为人性的基本范畴之一，不仅孕含着强烈的审美意蕴，而且，它往往以桀傲不驯的姿态与现存的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相龃龉，相对抗。因此它是检验人性是否自由的最好标准。在理性王国里，爱情总是以变态的形式出现，中国多烈女贞妇，又不乏男盗女娼，便是这种变态的表现形式。而在沈从文的人生社会的理想模式里，性爱又是那么自

由、热烈、真挚，没有道德的羁绊，更无法律的约束。人既按其本能而生活，又按其和睦而相处。这一点，构成了沈从文人生理想模式最基本的骨架。

(二)和谐的人际关系。作者在湘西系列散文中描写的湘西苗民与湘西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虽然有许多共同本质特点，但却有一点不同。散文中出现了强悍野蛮，刚强好胜的侠客、土匪，出现了流血、杀人、抢劫。但在他的湘西小说里却难得看到这种恐怖的局面，即使一对悲剧中的恋人作了悲剧的结束，也是那么美丽动人，如《媚金·豹子与那羊》。对生活的这种选择提炼，无疑表明了作者这样一种企图：他要用人道精神来真正织就一部人与人和睦相处真诚相待的人际关系网。所以在《边城》中兄弟俩情让的描写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作者心灵的裂缝与企图。一方面照茶峒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竞争，一方面兄弟俩必然有一个“情人奉让”。然而，无论是流血竞争还是情人奉让，二者都有背于沈从文人生理想的构想。前者打破了一个诗的和睦气氛，后者违背一个人的天然禀赋。在这种二难之中，沈从文显然认为人性自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而不是相反。于是作者采取利他的原则，让二老主动替大老唱歌，大老主动离家出走，双方的慷慨热情带来的是熙熙睦睦。兄弟之间能和睦相处，祖孙之间更是相亲相悦。爷爷的洞箫与故事，翠翠的歌声与笑声，形成特有的感情交流。虽然存在着“代沟”现象，但离不开真诚的关心与慈爱。以人道精神为本体建构的人际关系，和睦相处表现了这种关系的外在形态，而热情真挚，仗义疏财则体现了这种关系的内在构成。《雪》里面娘俩对“我”的精心关照，不禁使“我”大发感慨：“从一个朴素的组织中我发现这朴素的美”。这个“朴素的组织”就是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朴素的美”便是热情真挚。《长河》对人物的描写不免染上了现代文明的色彩，然而高尚的品德，深厚的民情还是灼灼闪光。一个孤舌的老水手，居然成了天天家里的一员；一个过路人走进桔园，可以任意尝鲜还得连吃带装；即使买卖桔子，并不斤斤计较而是为了消遣。最为集中地描写这种古朴风尚还是《边城》中祖孙二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还有茶叶烟草的慷慨奉赠，开水热水装备齐全，使这种和睦的人际关系在每个人身上都得到一种充满的体现，一种给予后的满足，一种习惯的风尚。

与此相联系的是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人物对血缘关系的淡薄。血缘关系是宗法社会最本质特征，也是使中国封建社会绵延数千年的主要原因之一。然

而在作者理想人生社会的模式里，这种血缘关系完全隐退了。顺顺的儿子死了并没有表示过多的悲伤；翠翠的爷爷死了还有另一个爷爷顶替；萧萧的儿子生了并没有发卖或沉水；族长的儿子龙朱还是以自己的美丽善良才赢得三姑娘的欢心……这一些说明了沈从文所构想的人际关系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人道关系为根本的新型关系。

这种和睦的人际关系，表面上看，和儒学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有相通的地方。但由于儒学开始便把这种完美的品德纳入血缘等级制度之中，以致发展到后来用宇宙图式的神秘方式强化这种等级制度的可靠性。因此，早期的一点人道主义也烟消云散了。而沈从文所描写这种和睦的人际关系则是建立在真正人道的基础上，很少附带条件，更无等级之分，对血缘关系的淡化，对和睦相处的强化，表明了作者一种心理选择和倾斜。

（三）朴素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描写得最广，有时使人感到他所描写的生活就是原始民族社会。这种印象的得来正表明了作者对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各种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的反感与厌恶。作者认为，社会组织的形成引起了人性的异化，而人性的异化又反过来证明了这种社会组织的荒谬。作者曾写过一篇《顾问官》。小说以讽刺的笔墨勾勒出了官场的腐败与贪婪，对“顾问官”自私巧滑，唯利是图的心理作了维妙维肖的刻画。但是，在真正勾勒他理想人生模式时，一般所谓官吏却被作者的笔赶开了，留下的几个模糊不清的面影也只是族长，船总、团总之类的地方当事人，更谈不上可怕的衙门，捐税，公案，师爷等。有时也出现军队，然而让军队参与湘西社会的实际生活却很少。这一些似乎表明了作者对阶级社会国家、法庭、军队等社会组织的淡薄而对原始氏族社会的向往。《神巫之爱》中的白发老翁，《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师傅，显然具有氏族酋长作风。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来看，人们还只是以渔猎为生。财产归氏族成员所共有，交换时以物换物，他们用歌声吸引女人，女人用情意满足男子，更具有一种原始的群婚形式。而这种遗风，在其它小说中还可以找到例证。

但撇开这表面的形式不谈，我们发现作者在这种淡化的社会组织中对民主性的点染。这种民主性，表现为极端的平等性。《边城》中船总顺顺，虽然是船总，但与老梢公并没有什么区别，而慷慨好客，济人之急则是相同的，毫无穷富的差别。《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他们把年长的当父亲，

同伴作兄弟。师傅不仅教给小伙子们以知识，而且还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就是于女人。他也并不因年纪稍长而失去勇敢与热情”。这种民主作风，毫无权势的距离。所以作者感慨地说：“人类的首领，象这样其才是值得敬仰的首领！”

沈从文所构想的人生社会的理想模式，具有鲜明的内在层次性和关系性。三个大层次以人性的自然发展为起点，以朴素的社会组织为终点，中间勾连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人性的自然发展不能影响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所以人际关系既建立在人性自然发展之上，又引导人性向健康优美崇高方向发展。而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消融于这一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和睦的关系扩大到全社会。在这种人道精神笼罩下的理想人生模式便显出宁静，和睦，优美，具有古朴、深厚的荆楚风味，又有近代西方人道主义影子。

三

但是，当沈从文以巨大的热情固执地展示湘西社会特有的风土人情的时候，当沈从文以他的生花妙笔来建构他的人生社会理想模式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他，说他是没有灵魂、没有理想的文体作家，说他是“不复进步的尚古作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沈从文这种寻根于源水流域的沉思与构想作些符合实际的解释。

沈从文身上流着苗民的血液，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对民族歧视，对战争、杀人极端反感。直到最近他还说：在他生长的凤凰县城里，人口还不到一万，然而却住了七千个兵，主要是用来压迫苗民，“因此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常见大规模的屠杀，特别是辛亥革命那段时间。这给我一个远久的影响——就是认为不应有战争，特别是屠杀，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杀别一个人”^①。这种最初的印象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一生，而且也培养了他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他判断事物的标准和构想人生社会理想模式的最初基因。

但是，当沈从文带着所谓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从边远闭塞的湘西来到文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闯荡人生的时候，他希望寻求一个较之家乡虽然古朴醇厚但不免愚昧落后充满血腥味的那种更文明，更美好，更宁静，更和睦的理想社会。然而，所谓近代文明，大都市，却让沈从文目瞪口呆。他看到的是唯利是图，争权夺利的庸俗人生观；他接

^①《沈从文集》第10卷第331—332页。

触到的都是一些“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①的读书人；他感受到的是那种人性的异化、扭曲，心理的变态“阉割过的侍宦观念”和现象；他知道的是连连不断的内战、杀戮，血迹，死尸。而对现代文明造成的民族品德的消失和痛苦的后果，沈从文探寻的视角又从大都市的扫描回归到沅水流域各个县份。而湘西社会所直承元楚遗风又很少受正统观念的影响保留下来的古朴淳厚的民情，又使沈从文从湘西社会的外部观照追寻到历史民族意识厚重的积淀层，从而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对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对古代文明的向往。沈从文说：“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的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②。这种怀疑和向往产生的心理落差，在他两度回故乡后更加明显。当他惊异于“新生活”——现代文明正在迅速地向着这块古朴的大地上渗透时，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忧郁和不安：“一种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流注浸润，实在太可怕了”^③。因此，沈从文由现代文明引起的双重（城市与农村）失望中，不能不对历史、现实、民族进行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象这么一个国家一群人民，把这个国家传统长处好好保持，或想法发扬光大，弱点则努力去掉，如治毒瘤恶疮，国家还会不进步”^④？出于这种爱国主义目的，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基本上沿着“发扬光大”这条道路建构起他人生社会的理想图式。

毋庸惊讶，沈从文所构想的人生社会理想模式并不纯化，因为它是建立在已经开始风化的湘西社会的基础上，不可能不沾染一些现代文明所滋生的污点。但是，沈从文坚持采取拒他性的原则，他把这里发生的一切罪恶，腐败，欺诈都让给了一些来往的客商，驻扎的军队，派来的官吏。如造成贵生悲剧的是《贵生》中的四爷；破坏了淳朴民情并杀死了七个野人的是《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官吏；四肢短小，杀人成性的是《会明》中的狃狃等。但是，这些否定性的形象不仅面目模糊，而且只是在少部分作品中出现，还没有构成一种完全形态的形象系列。因此，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整个地还是展现湘西社会特有的风俗民情，这为我们分析他所构想的人生社会的理想图式提供了方便。

沈从文所构想的人生社会的理想模式具有下列两个特征：其一，由于沈从文是以自己的家乡——湘西为题材来源，因此在保持古朴的民情民俗方面多具有三楚风味；其二，由于沈从文接受的是民主

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所以这一模式便充满了民主人道精神。由于上述两方面的特征，决定了这一模式三方面的功能：一、它承接的是三楚造风，因而它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相悖；二、它描写的风俗民情古朴淳厚，人际关系和睦相处，这不仅可以认识我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处，也可以明了现代文明的情落处；三、它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淳厚善良的风俗民情只有建立在人道主义精神之上。

对于作者构想的这一理想模式，我们不能一笔抹煞，因为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它的价值不在于它属于民主主义作家可贵而又可怜的思想境界，而在于它发现了一个久已失传但无比灿烂辉煌的文化心理传统，并且在他富于想象力的笔下得到栩栩如生地展现。不仅如此，沈从文在探寻深层历史意蕴中，在欣赏古朴淳厚的民情中，并没有敛起想象的翅膀，而是在古朴的生活中融进了更多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他对人性自然发展和人际关系和睦相处的强调，表明了作家对人的价值权利的自觉思考，对和平、宁静、和睦的社会生活的向往。而且，历史在累积中前进，社会在更替中变化。但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不管纵向的变化多大，横向的差异多殊，都不可能毫无交叉重叠的地方。认识这种交叉性和重叠性，对于完善某种社会形态仍然是有作用的。因此，沈从文所构想的人生社会的理想模式也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

对沈从文所构想的这一人生社会的理想模式，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寻求民族的新生，是在追求一种和谐的人生秩序，但由于它外在形态的古朴性，因而总觉得作者有那么一种怀旧的感情。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史，从历史的积淀层中考察问题，那么就不会对这种古朴性大惊小怪了。

中国神话由于历史化的原因，虽然只剩下一些零星碎片，但也不乏瑰丽奇妙的神话故事。例如《淮南子·览冥篇》：“往古之时……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蛟龙死，颛民生。和春，阳夏，杀秋，约冬。当此之时，卧偃偃，兴盱盱，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例如《淮南子·本经篇》：“昔客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祭粮于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践，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两段神话，都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一种理

①《沈从文文集》第1卷第166页。

②《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322页。

③《从现实学习》，《沈从文文集》第10卷第308页。

④《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386页。

想：和平安定，怡然自得，人情淳朴，天性活泼。神话是人们大自然所具有的神秘感和威胁感在想象中的一种理解和征服，因而，它既是想象虚构的产物，又是一种把现实理想化的产物。但是，在建构理想蓝图时，神话又总是以这种面目出现，它把自己的理想国建构在过去时态上，如上引的两段神话，前者把时间推移到“往古之时”，后者把理想安放在“客成氏之时”。这样，产生在远古时代表达人们理想人生图式的神话，便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与现实对立的理想的人生社会。总是放射出古朴的光泽。这种神话内容的固定性和表现手法的程式化便成为文学上一个基本母题和基本手段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层中积淀起来，从古至今，形成了文学史上一条有意味的发展线索。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有感于社会生活的大波大浪的时代而建构了他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一方面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平宁静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把这种理想寄托在“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原始氏族社会里，因而在理想的五光十色中做的是一场远古时代的梦。到了魏晋时代，陶渊明也同样有感于时代社会生活的大波大浪而建构了他的“桃花源”理想人生模式。这一理想人生社会模式描写的也仍然是恬静，和睦，怡然自得，热情好客，自然美与人情美交相辉映。然而作者却是用“桃花源”这一特殊的载体，把自己的理想运到了遥远的先秦。那么，到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里，不仅使这种古朴民情理想化、文学化，而且还具有一种浓厚的三楚遗风。所以，无怪乎有人指出沈从文有一种依恋过去的情

绪。实际上，人们在追求理想人生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种潜在民族心理习惯，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表现理想的“有意味的形式”。所以沈从文在构想他的理想人生模式时，不仅小说本身的取材范围和描写重点使它不得不具有一种古朴性，而且无意识的巨大磁场使他不可能摆脱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吸引，因此，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流露出某种怀旧之感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上面，我们对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作了一些肤浅表面的分析，尽管这种分析极不成熟，但它表明了笔者对沈从文作品的喜爱和重新深入分析沈老作品一种紧迫感。目前，在我国思想文化界一股寻根热来势迅猛。大家对传统文化或表现出蔑视的神情或露出亲昵的样子，都是希望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两个文明。但是，无论哪一种态度的同志，都把探寻的目光集中在绵延数千年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这个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但是，作为一种体系来说，它主要反映了我国阶级社会的整体面貌，它对人的价值的漠视造成的人性异化的恶果与封建宗法制度各种弊端是联系在一起，与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要彻底清除封建思想的余毒，一方面又想保留这一文化传统之根，在今天似有困难。我想，我们能否从沈从文的人生社会理想图式的构想中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参数，或者直接从荆楚文化序列中找到生命的根，活的根。我想，这就是研究沈从文小说最大的现实意义。

未收入《沈从文文集》的沈从文著作集

邵华强、凌宇编纂的《沈从文文集》十二卷于1981年3月至1984年11月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文集》共收录了沈从文在解放前出版的四十七种著作和大量集外逸文，总篇幅共有三百六十余万字。据笔者查证，除更大量的集外佚文没收入《文集》外，还有十六种著作集没编入《文集》。

据统计，全书未收录的有8种：《第二个狒狒》（1926年北京晨报社初版）、《市集》（1926年北京晨报社初版）、《呆官日记》（1929年上海远东图书出版公司）、《不死日记》（1929年上海人间书店出

版）、《长夏》（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刽子手》（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旧梦》（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看虹摘星录》（1940年江西出版）。个别篇章选入，但整书没收入的有《鸭子》（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昆明冬景》（1940年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等两种。

此外，解放后文物考古论文集均没收入《文集》。它们是：《中国丝绸图案》、《明碑》、《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明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6种。

（许 吕）